

论武术套路技术的“技击性”

刘文武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技击性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得以彰显,而具体情境中技击性的彰显包含了多种因素。它们所起作用虽然有大有小,但各司其职,能够从不同方面对武术的技击做出贡献。以此反观武术套路技术,主要包括了由内而外的4个层次:核心层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第二层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第三层奋已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最外层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4个层次技术在各种武术套路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构成了武术套路技术技击性的复合特征。由此得出研究启示:①用于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技术载体须依托于武术套路核心层的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②用于学校武术教育的技术载体应选择以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武术套路;③用于竞技和表演的武术套路应在奋已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基础上,适当增加表现攻防的技术的比重。

【关键词】 传统武术; 武术套路; 武术技术; 技击性; 武术教育; 武术竞技; 武术表演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4)01-0063-07

DOI: 10.15877/j.cnki.nsic.20240409.002

1 问题的提出

技击性是武术的核心功能,“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武术套路技术迟于明清时期形成直至今日,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成为武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1]。关于武术套路技术是否具有技击性,学界有“舞对合榫”和“击舞殊途”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与之相适应,人们对其的认识也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持“舞对合榫”观点者认为,武术技术是包含了“功法、套路、拆招、喂手、散手”或“功、套、用”多个环节环环相扣的体系,套路是武术技术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链条;另一方面,赞同“击舞殊途”观点者则认为,技击技术和套路技术是两套“不可通约”的“符码”,由于二者的“解码”机制完全不同,只能是“并行发展”(“打练并进”),无法做到“打练结合”^[2],即套路技术无需具有技击性,它的发展也不必受是否具有技击性所拘。人们关于武术套路技术认识的这种两面性各有道理,也各自存在着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缺陷。

第一,以“舞对合榫”观点认识套路技术确实有其“发生学理据”。“舞对合榫”最早由戚继光提出。“舞对合榫”的“舞”即自明代正式成形且广泛

记载于书的“套路”^[3],因为训练原则是“既得艺,必试敌”,所以要求习练者“先自舞,后捉对”^[4]。这种认识在今天仍然闪烁着巨大的理论光辉,它揭示了技击能力提升的普遍规律:任何武技都是先练好基本技术(舞)再进行实战对抗(对)。然而,这一观点在发展至今的武术身上变成了想象的乌托邦,实践中“舞”与“对”经常是相互齟齬甚至南辕北辙。究其因,由于此舞(套路)已非彼舞(套路),此对(国内外各种专业或职业选手)也非彼对(非专业选手和普通大众),所以在当时具有实践指导效用的“舞对合榫”,如今只是部分性地对武术实践发挥其理论价值,它的实际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为习武者提供了一个理想指向,虽不一定能至,却庶几可以近之。由戚继光《练兵实记》、俞大猷《剑经》、程宗猷《单刀法选》、吴殳《手臂录》等成书于明代的武术著作发现,彼时所创编的舞(套路),技术数量较少、动作结构简单、基本是由技击实践提炼出来的“招”和“势”

收稿日期: 2023-10-11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2021BTY00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23ECNU-YYJ018)。

第一作者: 刘文武(1982—),男,山东济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 武术基本理论; 学校武术教育; 武术竞技训练。

组成。“以步法及转身使各招式相承”(程宗猷《单刀法选》),构成了体系化的“路”,招式间很少有现在所谓的“连接技术”,也没有“跑趟/过门技术”,更没有在如今套路技术中占据相当大比重的各种腕花、舞花、抡拍、击响、回环以及跌扑滚翻技术。而后世出现的很多套路技术,由于逐渐脱离军事落地民间,受“俗文化”影响产生了明显的“融艺于技、技艺交织”^[5]的特征,如脱胎于《水浒传》的“武松脱铐拳”“燕青拳”,脱胎于《封神榜》的“文圣拳”就是显例。“视觉”在人的感官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对武术技术的观赏性需求的增加。由此,如何创造出更多能够使观者产生“拍案惊奇”效果的技术,成为武术技术生产者特别是以此为生的武术技术生产者的巨大创作动力。近现代以来武术套路种类呈几何级数增加,以及各种近似杂技、戏曲、体操式的技术被大量生产出来且流通于武术市场,皆与此密切相关。还有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求道”“问道”传统向武术的渗透,使套路训练更加偏重于“练为修”^[6]。落实到技术训练上,首先,动作轨迹的圆、弧等环绕技术增多(这样的技术相较直来直去技术更加含蓄隽永、意味深长^[7]);其次,动作速度由推崇“千有改,万有改,硬快没有改”转为推崇“以慢破快,以弱胜强”,典型者如内家拳的出现并得到武术界其他拳派广泛认同和借鉴效仿,“武术内家的出现,在训练上放弃了对‘肌肉、疾速、刚猛、有限、实在’的追求,一心沉溺于虚无缥缈的‘气意、舒缓、柔软、无限、神秘’”^[8];最后,动作意识由之前因对手“缺席的‘在场’”而向外,转为因对手“既缺席也不‘在场’”而向内,如“重意不重力”“守内不守外”“意气君来骨肉臣”等拳谚的流传,以及对自己身体所形成的“内劲”“整劲”的迷恋。

第二,“击舞殊途”的观点后于“舞对合轂”出现,由当代著名武术家蔡龙云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蔡先生认为,武术在古代就是由“击”和“舞”两种相对独立的技术体系组成,它们皆渊源有自:“击”在古代表现为军旅格杀术,在现当代则发展为散打、短兵等运动项目;“舞”在古代表现为“武舞”“套子武艺”等,在现当代则演变为套路运动项目^[9]。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很好地解答了上述“舞对合轂”在当下武术实践中所遇到的掣肘问题,因而得到了很多后辈武术研究者的认同,国家层面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的武术运动也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经过几十年实践探索,在“击”(散打运动)和“舞”(套路运动)各自的领域内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细、精、尖”成果,值得肯定。但其所存在的深层问题也无法回避:“击”和“舞”既然同属于武术范畴而非两个完全独立、互不相干的事物,那么二者之间就不可能只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必然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它们各自的发展也绝非只需“并进”就能万事大吉。而关于二者之间到底以什么方式发生关联、关联的程度又是怎样的,截至目前持此论者尚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实践中竞技武术将套路和散打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运动项目进行运作,特别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武术入奥目标确定下来以后,按照项群标准“深化改革”竞技武术下设各个运动专项,成为主导性的发展方向。由此,竞技武术的“异化”之途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人们对竞技武术的诟病不绝于耳,其中一种重要观点认为,如此开展武术,导致武术技术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动作外壳,而缺失了内在灵魂,武术之“民族文化性”就此被“阉割”^[10]。正如人与人之间因相互联结而形成社会一样,武术两大技术子系统之间也只有在相互沟通中才能产生“化学反应”(而非“物理组合”),建构起符号学视域中的“意义世界”;相反,各自为政的结果因切断了意义生成的桥梁而使武术丢失了魂魄,“击”和“舞”完全“分家过日子”的技术模式也令其在全球化语境中,自身的文化特色被冲淡,趋同于其他竞技项目。就实践角度而言,正因为现代运动竞技中格斗对抗性项群和表现难美性项群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关系,所以跻身现代运动竞技行列的竞技武术之套路项目和散打项目“车走车路,马行马道”实属必然;就理论角度而言,由于竞技武术的相关理论只是项目层面的,且相对于两个上位项群的已有项目理论还属于后发未赶超型的,所以势必要借助“文化”的棱镜,才能突出武术作为“民族体育”的特点。民族化的理论,西方体育化的实践,成为当下武术面临的尴尬问题之一。

在新时代语境下,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套路技术?既然人们公认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性,那么作为武术的下位概念,套路技术的本质属性亦应是技击性。但套路技术的技击性有着怎样的特殊性?对套路技术之技击性的重新认识又将对武术发展的不同

领域具有什么启示? 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本文探究的对象。

2 武术套路技术的结构层次及其技击性

通过对多类别拳种套路技术进行长期的练习实践和研修体悟,并结合与搏击对抗中所展现“技击”的比较,认为技击性的彰显包含许多因素,它们所起作用虽有大有小,但各司其职,从不同层面对武术的技击做出各自贡献。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有些看似不太重要的因素甚至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通过特定的显示技巧和功力的技术演练,能够威慑对方,起到“不战屈人之兵”的作用,虽然其并没有出现技击的行为,但实现了通过技击行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发展至今的绝大多数武术套路,都已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类型技术构成的“大杂烩”,其中有些清楚直观地反映攻防技击的“实景”,有些则较为含混模糊,还有一些的技击意涵已经非常牵强(但并非完全没有,不然也就不属于武术范畴了),它们有点像费孝通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差序格局”概念,如投石入水产生的波纹,由近及远(由内而外)构成了一个层次性的“网络”。杨建营^[11]则在将武术技术与数学进行比较后得出:“类似于数学数域的发展模式,由最简单的自然数向有理数、实数、复数层层拓展,武术技术的发展也是由最简单实用的技术向外逐层拓展才形成了目前种类繁多、技术风格不一的格局。”只不过杨建营是从整个武术技术体系着眼进行的分层,而我们认为作为武术技术体系环节之一的套路技术(不管是传统套路还是竞技套路),也具有类似于武术整体技术体系的层次性,在实践中因程式化需要而连接成通顺流畅的整体,在理论上可根据技击性的强弱程度由内而外对其进行分层。

2.1 核心层: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

该层次技术主要存在于少数传统器械套路中。武术史学研究表明,在清代以前的武术技术体系中,器械的地位是远高于拳术的。古代历史中很多著名的武术典故,如越女论剑、曹丕比剑、项庄舞剑等,以及清代以前的武术著作,如俞大猷《剑经》、吴殳《手臂录》、程宗猷《单刀法选》等,都是对于武术器械的记载。虽然明代戚继光创编的“三十二势长拳”属于徒手套路技术,但曹娅芳等^[12]研究指出,其

只是例外,而且戚继光认为“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际”,只能作为“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初学入艺之门”,并明确指出“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耳”。著名武术史家马明达^[13]认为:“明代和清初的武术典籍,其中就很少有拳术的内容,大概作者们不屑于此,不认为拳法是值得记述的。”

正因为有些传统的器械套路出自完全与体育宗旨相悖的技击格杀,所以这类技术往往具有“一击必杀”的特点,体现在动作节奏上就如中华剑艺所倡导的“一剑式”^[14]、大枪武艺所追求的“一发透壁”^[15],或进攻,或格防,瞬间完成动作,绝不拖泥带水。处于核心层的套路技术就是关于一门技术的主要技法。如剑术的主要技法格、洗、击、刺,刀术的主要技法劈、砍、监、扎,枪术的主要技法拦、拿、扎、点,棍术的主要技法抡、劈、戳、扫,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都属于或攻击或防守的单个动作;二是,动作结构强调“式贵于简”,用最直截了当的技术实现进攻/防守意图;三是,动作节拍短,正如俞大猷《剑经》中云“一技一节,一法一论”,基本是一气呵成、单个节拍内完成动作;四是,重力轻形,提倡穿透性发力而非制动性发力。这些特点在一些民间武术兵器爱好者的套路演练(如苗刀、鞭杆等)中,有着非常直观地表现。

2.2 第二层: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

该层次技术主要指套路技术中的“拳势”,其既包含于传统套路中,也包含于竞技套路中;既存在于徒手技术中,也存在于器械技术中。吴志青^[16]指出,“每一种定势之动作,固有繁简之分,即以最简略者而言,亦必合二三动作而始成一势,繁者且有多至五六动作者”。实践观察也可发现,武术套路中大凡称之为“××势”的技术,都是一个独立的拳势,它们并非上述只包含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而是由若干个繁简不一的动作组合而成,建构起一组完整的攻防序列。拳谚云“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十下八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拳势的组合技术特征。例如,少林拳中的经典拳势“云顶七星势”,包含了左右两个云顶动作和一个七星动作,前者为两个格防对方劈击的技术,后者为反击对方心窝的技术。又如长拳中的“燕子抄水势”(即仆步穿掌),包含了“盖、插、穿”三个技术要点,其中“盖”为格防,“插”和“穿”则为先后攻击己方身前和身后

的对手。武术套路第二层技术与第一层技术的共同点是都具有明确的攻防意向;不同点是第一层技术是由某个或攻或防的单独动作构成,而第二层技术则是由多个或攻或防的动作组合构成。相对而言,第二层技术在整个武术套路技术体系中所占比重更大,这类技术即杨建营^[11]所言,“需在一定条件和场景中才能应用的技法”,可以直接作为编排对练项目和影视武打“套招”的素材,也可以作为套路教学之“拆招”“讲手”的主要对象,但较难将其直接应用于真实的技击实战中——至少是在竞技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2.3 第三层: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

该层次技术主要存在于一些徒手拳术套路中。单拍脚、砸拳、乌龙盘打、翻腰抡拍以及各种腾空击响动作,都是该层次技术的典型代表。这类技术所具有的共同点是都要通过身体某个部位对另一部位或地面的拍击而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所谓“声震四方”“霹雳响九天”。其通过影响人的感官(听觉),对于观看者起到增加“看点”的作用,渲染现场气氛,提升套路演练的整体艺术效果;对于演练者则通过信息反馈机制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更富激情地进行演练。武术套路的第三层技术与第一层技术一样,有着悠久的源流出处。早在《礼记·明堂位》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从而产生了“击皮为鼓”的概念;司马迁所著《史记·张仪传》中则写到,“秦声,舞秦舞击缶弹箏,击膊拊髀”,其中的“击膊拊髀”,即击胳膊拍腿,是古代打完胜仗后的庆功宴上以示庆贺时的身体动作。杨宝生^[17]研究指出,这与现在红拳演练套路中的“放炮”“十大响”有着相同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武术套路中的抡拍技术主要是用来“观(听)”而非“用”的,其对人的影响侧重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通过运用一定的身体技巧发出可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响声,既可以产生气势上的威慑力,也可以增强娱人娱己的表演效果,所以能够伴随武术发展绵延不绝至今,在当前更加突出视听审美效果的时代背景下,甚至成为武术最主流、最显性的技术表现形式。

2.4 最外层: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

该层次技术在当前的各类武术套路中广泛存在。棍术、枪术中的舞花,刀术、剑术中的剪腕花,以

及其他器械因形制不同而创造出的不同形式的械花,都是该层次技术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该类技术是通过武术器械得以呈现的,天然地被赋予了“武术”属性;另一方面,该类技术都是围绕施技者身体运行且在过程中伴有加速度的技术环节,契合武术的运动节奏,这也为其具有攻防属性或是一定的攻防意图提供了推导依据。由此,认为该类技术属于纯粹的技巧范畴,往往会遭到反驳。不过,由于它们被用来作为“人前饰观”“展示技巧(功力)”的次数远远高于临场实战(如长、短兵竞技)中得以运用的机会,所以定性而言,基本属于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的范畴。而因为技巧的展示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18],所以尽管该层次技术与技击实用相距甚远,但由于符合了当今突出视觉审美功能的时代需求,也成为传统套路以及现代竞技套路借鉴、吸收的技术元素。

3 武术套路技术结构层次及其技击性对于武术发展的启示

如果说“武”所蕴含和表现的是人的本能的、直接的暴力行为,那么“武术”所蕴含和表现的则是文化的、直接/间接兼具的暴力行为。在由“武”→“武术”的漫长历史演化过程中,对于暴力的认识不断深化,达到暴力目的的形式和手段也不断丰富,乃至成就了今天学者所比喻“武术套路是保存武术技术的‘博物馆’”^[18]。这决定了今人看待武术套路技术时,不仅对于不同时期/类别的套路不能一概而论,即便是对于构成同一套路的的不同技术单位也应做到区别对待。根据上文对武术套路技术结构层次及其技击性的分析,主要从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传统武术、学校武术、竞技和表演武术三个维度,提出有关武术发展的启示。

3.1 用于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技术载体须依托处于武术套路核心层的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

提升技击性已经成为当前传统武术突破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19-21]。如上所述,影响技击性的因素很多,技术实践角度而言,“练什么”(即以什么技术为载体进行训练)无疑是其中基础且重要的一个。近年来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套路,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训练,只能起到发展“体能”的作用,却无济于“战能”的提升。基于此,

部分学者认为应将传统武术各拳种(套路)中的代表性单势提炼出来单独进行训练,将其作为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技术载体和训练单位。而代表性单势正是上文提出的隶属于武术套路第二层的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

研究表明,“世界空手道组手比赛中,单次最短攻防时间仅有0.3 s,最长只有1.8 s。表明空手道单次交手时间极短。”^[22]空手道比赛如此,其他格斗技击性项目亦然(都是在实战距离内以最快速度完成攻防)。对于传统武术而言,因为“武术运动作为一种体育形态,应当说是当今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23],所以无论是遵照其他项目规则还是自己制定规则,由“实用技术”转化为“对抗性竞技运动”^[24],乃展现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合法平台和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关键举措。适应“对抗性竞技运动”的技术是处于武术套路核心层的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只有以“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为基本技术单位进行训练,以体育竞技实战不断“打磨”其在瞬间即逝、间不容发情境中的适用性和变通性,并在此基础上丰富连发技术、组合技术,才能有效提升传统武术的技击性。大量的格斗竞技实践证明,以往作为成就传统武术“连招”的拳势,很难在真正的擂台实战中展现出“组合性技击”的效果。真实格斗场景中出现的“组合性技击”,是由“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所构成的组合,且其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临场发挥性的,并不依从“拳势”本身所具有的动作组合逻辑。换言之,遵循“更简捷更实用”的原则,用力方向由横广转为纵深,围绕单个攻防技术丰富训练内容和形式、设计训练方法和手段,正如形意拳拳理云,“要在一个形里生出许多东西来”^[25],并将这些“东西”对标竞技需要进行训练,才是有效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训练改革举措。而非像以往那样,由于将拳势甚至套路作为组织训练的基本技术单位,把过多精力用在了多元动作连接组合的完成质量上,忽视了单一动作由练至用的应变性能力的锻炼,导致在技击性提升上事倍功半。

3.2 用于学校武术教育的技术载体应选择以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武术套路

针对学校武术教育以竞技类套路为教学内容所产生的“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上武术课”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提出的解决对策是突出

武术的技击性和文化性。无独有偶,这一点也得到了法国里瓦尔河武术学校校长、趣味武术教学专家 Nassim Berrichi 的共鸣,他同样认为技击性和文化性兼具的武术才能使学生产生认同感,为此他已在自己的武术教学中做出了很多具有开拓性的改革尝试,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26]。韩青松等^[27]在欧洲所做田野调查及针对国际武联官员和海外武术从业者进行的深度访谈结果也表明,西方受众对于中国武术的基本认知是“文化与技击相融”。而关于如何突出武术教学的技击性和文化性,蔡仲林等^[28]学者提出要“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武冬等^[29]认为应“突出拳种、优化套路、强调应用、弘扬文化”;赵光圣等^[30]提出“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杨建营^[31-32]课题组则针对普通院校提出要“立足单势、强调技击、突出对抗、培育精神”,针对专业体育院校提出要“立足拳种、回归技击,形成体系、弘扬文化”等。通过对既有研究结果进行综合比较和深入反思,本文认为,首先,无论对于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套路的形式不能抛弃。套路是中国武术相比其他武技类项目最为突出的文化特色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武术最主要的技术构成。如果武术教学舍弃套路,不仅武术教育之文化性的彰显将失去重要的载体依托,而且大、职、中、小等不同层次学校武术教育“一体化”教学内容该如何设置,也将成为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其次,中国武术套路不计其数,既有传统套路和竞技套路之分,二者各自所包含的套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用于学校武术教育的技术载体对于套路的选用必须有所取舍。以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武术套路是最佳选择。一方面,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即武术技术的基本单位——拳势,其是介于完全致力于技击实用的核心层与突出技巧性和审美性的第三、四层之间的一种技术类型,正所谓“取其两端而用中”,以该层次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武术套路,能够更好地兼顾武术的技击性和文化性而非像核心层和第三、四层技术那样囿于一端。另一方面,笔者在进行武术教学实践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对学生“防身自卫”的武术课价值期待仍需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少就大部分学生(多数男生和几乎全部女生)而言,“条件性技击”更接榫他们对于“技击”的实际需求,“拳拳到肉”“出手见红”式的技击对于

他们有点像叶公好龙,更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观赏,却并不热衷“以身体之”的亲自参与(有学生会出于好奇愿意一试,但之后就不想再继续了)。而正如上述,以“拳势”为代表的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最适于用来拆招、讲手和条件性的喂手实战,其与学生对武术课的需求相比其他层次技术也就更加贴合。

3.3 用于竞技和表演的武术套路应在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基础上,适当增加表现攻防的技术的比重

实践证明,相较于核心层和第二层技术,第三层的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第四层的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作为“练为看”的功能展现,更能起到使人拍手叫好的效果,观赏性相对更高。这也正是虽然学界很多人以第三、四层技术为对象对现在流行的套路进行过种种批判,但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所呈现给观众的武术表演中,该类技术仍是观众们常见的“景观”之原因所在。仅从“看”的角度出发,如果说核心层和第二层技术在整个套路的叙事结构中处于铺垫的地位,是谜面,那么第三、四层技术在整个套路的叙事结构中则处于高潮的地位,是谜底。正因如此,我们在观赏武术表演时会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在整场节目表演展开的过程中,观众们鼓掌叫好的“节拍儿”,往往是在表演者成功地完成某个或某组第三、四层次技术以后。

然而需要清醒的是,用于竞技和表演的武术套路是以“武术”为定语的比赛和表演,欲使用于比赛和表演的武术套路更具有值得回味的耐看性,从而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就一定要令其与体操、技巧、杂技、舞蹈等比赛和表演形式区别开来,彰显出自己独特的品质和风格。虽然如上所述,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攻防属性,但毕竟“味儿”较淡,在服务于彰显武术表演独特的美方面,力度不足。究其因,这两类技术的完成基本无法使观者看到戴国斌^[33]所谓的“对手‘缺席’的在场”,而其正是蔡龙云^[9]提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才能完美地表现套路运动”的关键要素。所以,“适当增加表现攻防的技术的比重”就成为用于比赛和表演的武术套路今后发展中需要改进和优化的方面。即在以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为武术套路的比赛和表演制造高潮的同时,也要通过增加更多一

攻一防的单个动作和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夯实武术本色之基,使其葆有明显的区别于其他项目的气质和风采,在竞技和表演领域充分表达出武术所蕴含的独特美感。

4 结语

既然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属性,那么套路就不可能是人们所谓的“花架子”。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技击。通过对技击情境的全面检视发现,与其他很多概念一样,技击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击是“只有满足进行搏斗的过程,才能称为技击”^[34],而广义的技击则指所有与技击有关或是能对技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正向的能够增强技击效果的因素和负向的能够通过作用于对手的感觉及心理而避免技击行为发生的因素。依据动作技击性的强弱程度,整体意义上的武术套路技术包括了4个由内而外的层次:核心层的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第二层的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第三层的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最外层的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4个层次技术在全类武术套路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异的构成比例决定了不同武术套路所具有技击性的“强度”。该结论的获得对于不同领域的武术发展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用于提升传统武术技击性的技术载体须依托处于武术套路核心层的一攻一防的单个动作;用于学校武术教育的技术载体应选择以攻防兼具的组合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武术套路;用于比赛和表演的武术套路应在奋己惊人的抡拍技术和显示功巧的花式技术基础上,适当增加表现攻防的技术的比重。

参考文献:

- [1] 邱丕相,蔡仲林,郑旭旭.中国武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 [2] 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 [3] 马文友.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武术审美文化转型、成因及当代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3,37(5): 11-19.
- [4] 周伟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0.
- [5] 高亮,麻晨俊,张道鑫,等.在场与出场:中国武术阴阳思想探析[J].体育学研究,2019,2(2): 23-30.
- [6] 王少宁,杨祥全.“体用”境迁: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J].体育学研究,2022,36(3): 91-101.

- [7] 戴兵,李信厚.太极拳“听劲”概念诠释、理论逻辑和实践理路[J].体育学研究,2023,37(2): 35-41.
- [8] 韩起.八极拳的“逆思维”格斗训练(续五)[J].搏击,2007(6): 64-65.
- [9] 蔡龙云.剑楼武术文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 [10] 周伟良.文化安全视野下中华武术的继承与发展——试论当代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J].学术界,2007(1): 59-78.
- [11] 杨建营.武术分层技术体系的构建[J].体育学刊,2011,18(2): 121-128.
- [12] 曹娅芳,李吉远.由器械至身体:明清武术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23,45(3): 87-93.
- [13] 徐才,韩宁,马明达,等.21世纪太极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太极拳国际论坛主题发言纪要[J].体育学刊,2004,11(5): 1-6.
- [14] 冯香红,杨建营.中华剑艺的体系化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以世界剑技的历史演进为背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2): 145-156.
- [15] 彭国强,杨建营.明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技法复原与解读[J].体育学刊,2023,30(4): 33-42.
- [16] 吴志青,金铁鑫.查拳·醉八仙拳谱·武艺精华[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 [17] 杨宝生.中国红拳[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18] 程大力.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 [19] 罗应景,杨建营.李小龙海外传播“功夫”的实践对中华武术走出困境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21,43(3): 64-70.
- [20] 杨建营.中华传统武术技艺困境突破的具体方略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5): 61-69.
- [21] 刘文武.中国武术技击现实与境界的尴尬与救赎[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55(1): 65-72.
- [22] 张楠,刘卫军,段传勇,等.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空手道运动生物学特征研究进展[J].中国体育科技,2021,57(7): 17-24.
- [23] 邱丕相,杨建营.武术概念研究的新视野[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6): 1-6.
- [24] 杨建营.从人类武技的文明化进程探析传统武术拳种的未来出路:体系化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体育科学,2022,42(9): 82-89.
- [25] 杨国珍,段丽梅.武术功夫习得与主体转化[J].体育与科学,2021,42(3): 58-63.
- [26] 刘文武.一个外国习武者的武术教学改革实践——法国卢瓦尔河武术学校创办人Nassim Berrichi访谈录[J].体育与科学,2020,41(4): 45-52,44.
- [27] 韩青松,朱东,THEEBOOM M. Kung Fu还是Wushu? 中国武术海外语言符号的话语困境与消解[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1): 87-96.
- [28] 蔡仲林,施鲜丽.学校武术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1): 62-64.
- [29] 武冬.体育教育专业武术课程教学内容和改革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 [30] 赵光圣,戴国斌.我国学校武术教育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选择——写在“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成立之际[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1): 84-88.
- [31] 杨建营.普通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理念探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4): 128-133.
- [32] 杨建营.体育院校武术专业技术课程改革理念探析[J].体育科学,2018,38(12): 3-10.
- [33] 戴国斌.武术对手的文化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5): 65-70.
- [34] 姚建军,刘宇峰,尹天安,等.技击概念辨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6(2): 55-56.

(下转第81页)

How Can Community Media Promote Agile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Spor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ituation-Cognition-Action (SCA)

SHI Lizhen¹, HUANG Xiaoling¹, LI Zengguang¹, LI Xiaodong², TAN Xuefeng¹, DENG Liang¹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ituation-Cognition-Action”, we analyze how community media effectively diffuse sports information to help community sports achieve agile governance around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aily sports activities in a community.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XFZ reveals that the media matrix of spor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XFZ communi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erfect. From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community media, it is found that the feedback channel has changed from available to excellent: the media has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he agil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ports; the solution efficiency has changed from slow to fast: the community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rapid communication are the “catalyst” for the agil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sport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ervice providers has turned from weak to strong: the media has become the “community connector” of grassroots sports agile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perception”, further resource “action” strategies are given: upgrading the community sports communication matrix, focusing on the granularity of spor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are also used to disseminate sports information, helping to create an orderly and dynamic sports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mmunity media can shape the “capable person” and authority to drive the agile of sports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ty media; community sport; fitness for all; agile governance; spor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上接第69页)

Fighting Function of the Techniques of Wushu Routine

LIU Wenw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fighting function needs to be demonstrated in specific situations, which contains multiple factors. Althoug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may vary from one another, each plays its own role and contributes to Wushu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 this way, Wushu routine technology mainly includes four levels from the inside out: the core layer of a single action of attack and defense, the second layer of a combination of both attack and defense, the third layer of amazing swinging technique, and a fancy technique that displays skill in the outermost layer. The four levels of technique exist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all kinds of Wushu routines, which constitute the composite fighting function of Wushu routine techniques. The research therefore suggests: ① the technical carrier used to improve the fighting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must rely on the single action of one attack and one defense in the core layer of Wushu routine; ② the technical carrier used in school Wushu education should choose the Wushu routine composed of a combination technique of both attack and defense; ③ Wushu routines used for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should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attack and defense techniques on the basis of the amazing swing technique and the fancy technique of showing skill.

Key words: Wushu routine; Wushu techniques; fighting function; traditional Wushu; Wushu education; Wushu competition; Wushu performance